

中国译论通史:重难点发掘与书写范式革新

黄忠廉¹ 张旭² 蓝红军³ 朱健平⁴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翻译学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420; 2. 广西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0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4.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外国语文》2025年3期刊发了《硬核与疑难:中国译论发展探索之要》一文,本文在其基础上补论中国译论通观之重与难,并探索译论通史书写新范式。黄忠廉认为译论通观重点在于“三建机制”与史料整合,难点涉及史论平衡与深度描述。他强调以重点为导向突破难点,通过“分析性叙事”实现译论史重构,推动中国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服务话语建设。张旭认为重点包括文献整理考证、主题演变与社会文化互动、学术特质与理论价值提炼;难点涉及文献散佚甄别、分期分类界定、理论体系重构与学术定位、跨文化比较与现代转化等,并提出数字化建设等解决路径与展望。蓝红军提出厘清中国译论发展史的起点和历史分期是关键问题,而历史性的研究是为了观照未来的发展,将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翻译理论体系作为目标。翻译理论史书写不是讲述我们过去有过什么翻译理论,而是回答我们为何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过去的翻译理论,以便明确我们该怎样打开新的思想空间,怎样构建未来的理论世界。朱健平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推动中国译论史研究的范式革新。研究应超越史料整理,通过“基建、复建、创建”机制,将译论发展置于社会历史条件中考察,突出翻译作为“物质性跨文化观念再生产”的本质,旨在构建主体性、系统性、时代性的译论史叙述,推动中国译论从地方性知识向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贡献升华,实现学术自觉与文化自信。

关键词:中国译论史;文献考据;现代转化;历史分期;未来发展;唯物史观;范式革新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1-0015-15

中国译论通观之重之难补论

《外国语文》2025年3期刊发了拙文《硬核与疑难:中国译论发展探索之要》,题中“硬

收稿日期:2025-10-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翻译思想发生机制与发展路径研究”(23BYY1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翻译研究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1BYY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忠廉,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张旭,男,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与跨学科研究。

蓝红军,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译学理论批评和翻译思想史研究。

朱健平,男,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典籍译介、翻译史研究。

注:四位作者为共同第一作者。

引用格式:黄忠廉,张旭,蓝红军,朱健平.中国译论通史:重难点发掘与书写范式革新[J].外国语文,2026(1):15-29.

核”“疑难”有吸睛之用,前者为当代用语,指坚实可靠的核心,具有学术质感;后者专指待解决的学术问题。2025年9月28日,《外国语文》编辑部举办了“外国语文大家谈”第十讲《关键与顽疾:中国译论古今通观》,题中“关键”“顽疾”通俗有力,可助听众紧抓核心矛盾,并引起兴趣。

上述一“文”一“讲”,所靶向的均是中国译论发展研究的重中之重与难中之难,具体是“为厘清发展脉络,廓清认识,重写译论史,需在尽收史料基础上,聚焦研究之硬核”,即创设中国译论发展的“三建机制,夯实基建、重在重建、力推创建;与之相应,中国译论发展研究的疑难不容小觑,对中国译论的厘清、溯源、描摹、阐释面临种种挑战,写史必备的史才与史德更是不可或缺”(黄忠廉等,2025)。现就中国译论通观之重之难作四点补充。

第一,中国译论通观之必要。“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研究”实际是中国翻译研究之研究,可谓是通观中国译论,其结果是中国译论通观,最终可写成《中国译论通史》。如何写?“写‘通史’要用长远的、宏大的眼光看问题,要从历史中找出趋势性或‘规律性’的东西。用这种方式写出的‘通史’,当今欧美学术界通常把它叫做‘宏大叙事’。”(李剑鸣,2017:自序6)

“通观”之“通”,有“整个、全部”之意;那么,通观中国译论便指全面地观察或总体考察中国译论,强调打破零散研究,重在对其发展作出整体的系统性把握,也暗含或略含对未来的谋划。换言之,中国译论通观在空间上强调所观译论范围的完整,结构上要求涵盖译论的局部或整体,逻辑上要求超越局部的视角,最终予以综合分析。对中国译论的通观,所取的是一种哲学视角,是一种系统性思维方法。这一哲学高度要求论者既重视微观局部或细节,又揭示局部的相互联系及其蕴含的规律。

第二,中国译论通观的重中之重。中国译论通观的重中之重即中国译论通观之关键,指中国译论通观要考察的最关紧要的、对其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厘清并解决好关键问题,有利于事半功倍。要言之,中国译论史研究的硬核体现为以“重写译论史”为纲,以“收全译论文献”为基,以创设“‘三建’发展机制”为重,重写中国译论史,虽说是“论”的史,却也要产生“史”的论(黄忠廉等,2025)。

重点即整个研究更重要或更主要的部分,或是同类事物中具有重大意义、价值、作用或影响深远的部分,多与要解决的对象相关,这样的部分往往会引起重视,内容上受人看重。译论事实多,而“历史事实之不同一般事实,重点即在于历史家所见之意义。事理虽然客观存在,但为史家赋予命义方为史实”(王尔敏,2005:138)。就质量而言,但凡足以反映译论发展重大趋势或重要思想、反映历史意义的事实,均可视作史实。史家的使命至关重要,其修养自然要深,心态要正,态度要慎,史德要高。尤其是译论史的重建,“控制着事实之选择与解释,如此方有历史事实出现”。“历史家之任务,一方面发掘少数有意义之事实,使之

变为历史事实;必须抛弃非历史的事实。”(王尔敏,2005:143)马祖毅(1984)、罗新璋(1984)、陈福康(1992)、朱志瑜(2020)等各家已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今后的工作仍将继续收集论译史料,但多半是查漏补缺,重点不再是搜集资料,而在其使用与阐释。这是译论发展研究的质变。

重点应是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根据实际找出最重要而不得不突破的译学问题。中国译论通史有其丰富的思想来源,对各种思想或理论展开溯源之探,亦是应该重点探究的课题。时时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抓住其中的重要人物与重要问题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因此对中国译论的渊源、背景、流变、内核、体系、关联、方向、特色、功能等进行认真发掘、系统梳理应是重点。

重点还指能积极推动研究进展的主要或重要的方面。重点是超出一般,超出以往,因此宜从内容的正面突出,可解学界之渴,给同行以答复,给未来以希望,给过往以鉴定或评价,因为重点是评价与比较的结果,是与历史相较、与当下相切、与未来对话的结果。譬如,探索中国译论发展,应重在厘清哪些因素促进了译论的产生与变化,分清内因与外因:内因是中国本土几千年译论的发展,外因则是西方译论的输入。中国译论真正发展归功于近50年来西方译论的输入,这恐怕要占一定篇幅,但二者必须兼顾,缺一不可。当然,融通古今中西的过程中,需保持文化自觉与译学自信,最终实现中国译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第三,中国译论通观的难中之难。视疑难为中国译论通观的“顽疾”,有点言重。因为治中国译论史,肯定有疑有难,存在疑惑而难于判断或处理的问题,但不能绝对说难治或久治不愈。就中国译论发展研究而言,疑难主要来自对译思译论的厘清与反思、溯源与剥离、当代译论的描摹、传统译论的阐释以及译史书写对史才、史德的要求(黄忠廉等,2025)。

难点是中国译论发展研究中不易、很难解决或做起来很费事的部分,多与解决方法相关,也是对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反映,包括认识层面、学科指导、理论基础、思想提炼、研究方法、材料发掘等。考察目前无法解决、但经努力能够解决的种种困难,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需清醒认识的研究困境。难点有显有隐。显性之难,如时间短、战线长、规模大、任务重等,但只要投入,就不难解决。隐性之难,即各种不点不破的疑难杂症,如不可控和需控因素多、需多方会诊、需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等。这些难点多是中国译论通观不易解决之处,是需突破的地方、需解答的疑惑、颇为棘手的问题、需攻克的难关等。为此,需对难点的梯度有清醒的认识,这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1)困难:一般的阻碍或挑战,譬如机检、数据库、语料库的建立,减轻了人工劳动,但并非所有的译论文献均已数字化。因此,本土冷僻文献仍需人工检读,这也是捍卫中国译论话语权的基础。

(2) 繁难: 复杂繁琐或难以应对, 重点是回溯及审视中国译论发展, 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对译论话语断章取义以及脱离语境任意发挥等, 这成为当下学人应时时自醒的难题。中国译论到底有无特色, 有无流派, 需要有理论自信与创建底气, 中国翻译学人占世界之最, 其中也自然形成一些学术团体, 逐渐形成学派趋势, 能否使其明晰, 各派本身及其之间的思想谱系及其社会背景的深入探究也是一大挑战。

(3) 艰难: 事情或任务非常困难, 需付出较大努力, 克服较多困难。中国译论通史之“史”“论”处理是个难点。“在学术研究中, 如何安排‘史’和‘论’向来是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难题。如果只罗列历史, 则难以厘清其发展的线索和本质; 如果只谈理论, 则又有空疏之嫌。”(喻仲文, 2013: 19) 中国译论通史重“通”, 呈现为“史”, 突破点在于形成“史论”, 论成为特色, 却要以“史”证“论”, 史又成为主体, 占幅最大。因此, 中国译论通史之“史”与“论”必须相互阐发, 以“论”带“史”, 以“史”证“论”, 以“史”托“论”, 其中理论推衍的痕迹既要有, 又不能过多, 这个分寸极难把握。

(4) 艰巨: 任务、责任或工作非常艰难, 需付出巨大的努力与耐心。中国译学历经了百年学科建设与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 已备学科创建的条件与能力, 此时更应重其体系、原理、方法的创立, 以横向开放、纵向比较的视野, 基于中国译论话语、资源以及中国问题意识, 形成中国译论特色与学科特点。而中国译学“三大体系”尚在构建, 因此研察中国译论史需高度客观、严肃、冷静的分析, 厘清努力方向与未来愿景, 于应然之下研究实然。

第四, 书写《中国译论通史》之双维兼顾。中国译论通观之重之难是《中国译论通史》落笔成书的两个维度, 二者的关系又是双重的, 即相重与错位, 前主后次。

首先, 重点与难点二维相重。有多重, 就有多难, 即重点与难点重叠。重点明方向, 难点定效率。核心问题需深入理解、大量投入、凭复杂技能解决时, 重点便成了难点。可见重、难点与问题解决密切相关, 问题有多重要, 就有多难解决, 二者就自然并驾齐驱。如果说“机制揭示、规律发现、原理说透、理论创建、学科创立”等, 是从正面说重要、是重点, 那么, 依重推难, 可从反面突出它有多难。具体如中国译论体系创建, 应是当下及未来中国译学发展的重大议题, 涉及系统阐发、基本思想及原则, 置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思考系统构建。既然重难相对而立, 通观中国译论的最佳方略是: 以重点为导向突破难点, 以攻克难点解决重点。

史料学是史学研究的基础, 史料是治史之源, 为学之基。朱熹评价孔子学问是“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 其功则倍于作矣”(王海光, 2014: 288-289)。译论史料收集、整理、校勘乃功德之事。当代存史, 责任重大, 中国译论当代史料的收集虽说方便, 但整理工作依然繁且重, 在此重点与难点合一。当今学人多以著述为能, 文不简, 思不精, 整理剔梳不易。

既然中国译论发展研究是研究之研究,则少不了“论”,而“论”的主要方式是分析,也是要求史家具备的重要能力。因此“‘分析’取代了‘叙事’,成了历史学家最常用的方法。分析就把事情拆开,一条一条地说出其中的道理来;我们常说‘条分缕析’,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方法用到极点,就出现了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讲观点、不讲故事的弊病。于是,传统的‘叙事’方法又回归了”(李剑鸣,2017:自序6)。这也是要防范的问题。不过,此时的回归不是“看山是山”,而是在经过“看山似山”、融合分析成分、带有分析的意图之后,融合史家对译论的认识,最终实现了“看山只是山”。有人将这种回归的叙事叫做“分析性叙事”。叙事再次受到了重视,但其宗旨仍在于分析。“‘宏大叙事’的好处,是能提供一个清晰明了的大画面;它的缺点是‘只可远看,不可近观’”(同上)。若拿放大镜看,会发现简单化与过度化概括,抽象与具体会成为此类研究的瓶颈。在此,重点又成为难点。

其次,重点与难点二维错位,即:重不一定难,难不一定重。译论通史书写的重点或因简单、基础而容易掌握,如史料搜集整理等;或因复杂而成为难点,如千年译论脉络的勾勒等。难点或对通论目标影响较小,或直接关联重点,如通观中国译论发展,描述是基础,目前深度描述还不够,仍是重难点。在邓金(2009:124)看来,深度描述涉及“微观的、宏观的、历史性的、传记性的、情境性的、关系性的、交往性的、插入式的、不完整的、概括性的、纯粹描述的、描述性与解释性的”。中国译论发展期待完整的深度描述,或是历史性的、传记性的,或是情境性的、关系性的,但并非所有的深度描述都是完整的,或重关系,或重个人,或重情境,各有侧重,可分类深度描述。这便造成了重与难的不对应。

最后,重点与难点更会因有偏重而偏得。仅关注重点,因难点未解决而或许事倍功半;仅关注难点,因陷于细节而或许偏离主要方向与重要目标。为此可充分利用二维关系提升研究效率。优先解决“重点中的难点”,集中精力突破那些对整体目标影响最大的困难部分,避免在非重点难点上过度耗时。同时识别重难点的真伪,有的问题看似难点,却只需换思路或尝试新方法即可解决,如在数字化的当下,机检代替传统的手检,既是重点也是难点的史料整理就不再那么重与难。重点与难点无论是错位还是相叠,均需高端站位,最终目标是构建译学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中国(译学)话语的建设。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也谈中国译论发展史研究之重点与难点

中国译论历经近两千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与丰富的思想资源。20世纪初以来,吴曙天(1933)、黄嘉德(1940)、刘靖之(1981)、罗新璋(1984)、《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a, 1984b)、陈福康(1992)等学者和学术团体,为其发展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近年朱志瑜等(2009, 2019, 2020)借助大规模文献搜集与统计,揭示传统译论主题规律,推动研

究进入定量定性结合新阶段。但传统译论文献分散、表述零散且深嵌社会文化之中,研究挑战不小。明确核心与重点难点、建立科学范式,可梳理历史脉络,为建构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提供支撑。

1. 中国译论发展史研究的核心重点

首先,文献系统整理与精准考证是译论史研究的基础,其完整性与准确性直接影响到研究的可信度。中国传统译论文献载体多元(如译著序跋、报刊文章、机构章程、朝廷奏折等),且分散于海内外馆藏,整理难度大。文献搜集需要全面打捞一手资料,如朱志瑜团队历时20年,从海内外报刊、古籍、译著中遴选1950年前的文献近2000篇,最终筛选出有效研究文献900余篇(含翻译通论、译者序跋等五大类),重点覆盖佛经译论中的经录僧传、近现代文艺期刊等核心载体,并纳入传教士、外籍学者的部分中文译论成果,以突破地域与载体限制。文献考证聚焦真实性与关联性甄别:其一,核验文献作者、出版年代及原始出处,修正既往汇编中的误载与遗漏;其二,严格依照“讨论翻译理论或方法”的标准筛选,剔除仅描述翻译实践而无理论思考的内容(如林纾200余部译作中仅保留22篇涉翻译思想的序跋),确保研究对象精准;同时需要辨析重复表述与衍生论述,避免数据冗余。

其次,主题演变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联是中国译论研究的鲜明特质与核心重点。译论主题的阶段性特征深刻反映社会变迁需求:三国至1919年,译论集中于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译名统一及翻译政策选材(占比32.36%),凸显了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需求;1920—1949年,新文化运动与西学东渐推动主题多元化,直译意译论战、语体文欧化、文学翻译(如译诗)、翻译批评等成为焦点,体现了翻译功能与认知的转变。主题研究需要挖掘核心命题的历史传承与创新。译名问题贯穿古今,从佛经“名义”处理、明清科技术语统一到民国文学名词审定,形成了清晰脉络;翻译标准从“质”到“信达雅”,再至“神似”“化境”的演进,深化了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此外,需要关注翻译规范的竞争与融合——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译论分歧,展现了不同学术团体对翻译理念的探索与碰撞,揭示了译论发展的内在张力。这种主题演变与社会需求的同频共振,正是中国译论独特学术价值的根源。

再者,学术特质的提炼与理论价值挖掘是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史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与西方译论的系统化、理念化不同,中国传统译论以解决具体翻译问题为导向,注重可操作性,形成独特的实用性与本土化特征。学术特质研究需要归纳理论生成方式:中国传统译论主要通过译者序跋的经验总结、翻译实践的批评评论、通论性文章及专题讨论四种路径形成。其中,翻译评论(占比27.35%)与专题讨论(占比17.49%)凸显了其与实践的紧密关联,由此决定的“就事论事、点评式”表述虽缺乏系统理论框架,却蕴含着深刻的实践智慧。同时,需要挖掘本土化理论命题的学术价值:严复“信达雅”标准历经百年争议,始终

引领中国译论的发展方向,成为中西对话的关键节点;傅雷“神似”、钱锺书“化境”将传统美学融入翻译研究,开创了独特视角;佛经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译者八备”等理论,则体现了中国对翻译过程、译者素养的独到思考。这些命题不仅是本土译论的核心成果,更亟待深入阐释其理论内涵,以彰显中国传统译论区别于西方的学术价值与世界意义。

2. 中国译论发展史研究的关键难点

首先,文献的散佚与甄别困难是译论史研究的首要难点。一方面,早期文献散佚严重:200余篇仅见提及而无原文存世,1900年前译论数量仅相当于20世纪前20年的总量,佛经翻译理论更分散于经录、僧传且呈片段式表述,需要从海量宗教文献中艰难甄别。另一方面,文献甄别与筛选面临双重挑战:其一,部分文献标题模糊、内容跨多主题,需要跨类别综合分析;其二,近现代报刊中大量匿名文章存在作者归属不清、出版年代不详等问题,考证难度极大。此外,需要严格区分翻译理论与单纯译事记录——仅讨论翻译实践而未涉及理论思考的文献应予以排除,这对明确甄别标准提出更高要求。

其次,分期标准与主题分类的科学界定是译论史研究的重要难点。分期方面,现有研究多以历史纪年或重大事件为依据,如朱志瑜等分为三国—1919、1920—1923等六个时期,罗新璋按古代、近世、近代等五段划分。但翻译发展与历史纪年并非完全同步,鸦片战争(1840年)、五四运动(1919年)等历史节点未在译论发展中形成明确学术断裂,此类分期可能掩盖演变的连续性。如何结合译论自身主题变化、理论创新等内在特征制定科学分期标准,亟待解决。在主题分类方面,众学者采用标准差异大。黄嘉德将译论分为翻译通论、译名、译诗、翻译史四类;朱志瑜等细化为五大类16个次类,但仍存在交叉重叠,如“译诗”既属专题讨论,又与文学翻译关联紧密。此外,新文献不断涌现,现有分类难以涵盖所有主题,如科技翻译论述多蕴含于译名讨论,尚未独立分类,优化分类体系以体现译论丰富性与关联性,是分类研究的核心难点。

再次,理论体系的重构与学术定位困境是译论史研究的核心挑战。部分学者尝试通过主题提炼建构体系,却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传统译论核心概念如“文”“质”“神似”等模糊且多义,不同历史时期内涵有差异,难以统一界定;二是译论主题看似分散,虽有“以实用为标准,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主线,但各主题逻辑关联不明,重构体系易陷入“碎片化拼接”之困境。在学术定位上,存在着两种极端倾向:一是过度强调中国译论独特性,将零散论述等同于系统理论,忽视其历史局限性;二是以西方译论为参照,否定中国传统译论学术价值。如何在客观认识其学术特质的基础上,避免“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本位主义”,实现合理学术定位,是关键难点。

最后,跨文化比较与现代转化的衔接是译论史研究的深层难点。跨文化比较层面,中西译论因生成背景、思维方式与表述差异显著而面临挑战;西方重逻辑体系建构,中国则尚

实践感悟与文化契合,简单概念对应或优劣评判易导致文化误读。核心在于立足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的差异,建立合理的比较维度,揭示各自价值而非机械对比。在现代转化层面,需将传统译论资源转化为当代翻译理论的有机组成,但路径尚不明晰。传统译论的实用性虽与当代实践存在天然衔接(如“译名统一”仍具现实意义),但其历史语境下的解决方案(如“语体文欧化”)难以适配当下多语种、跨学科的需求,传统命题的现代价值亟待重新挖掘。同时,转化过程中需警惕“过度诠释”,在尊重历史原境的基础上,精准激活传统译论对当代的理论启示,实现古今对话的有机衔接。

3. 解决路径与研究展望

针对研究重点与难点,可从四方面探索解决路径:一是加强文献数字化建设,建立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数据库,整合海内外馆藏,实现集中检索与共享,同时用文本计量方法优化文献甄别与分类效率;二是建构历史语境、主题演变与理论内涵三位一体的研究框架,以历史语境为基础,结合译论自身特征制定分期标准,通过主题类聚优化分类体系;三是采用描述性重构梳理理论脉络,尊重传统译论零散化特质,重点挖掘核心概念的历史演变与逻辑关联;四是建立辩证跨文化比较视角,关注中西译论差异与互补性,避免单一评判标准,同时立足当代翻译实践,探索传统译论的现代应用场景。

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加以拓展:一是扩大文献搜集范围,关注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中文译论文献,补充现有研究缺口;二是加强跨学科研究,结合文化史、思想史、语言学等视角,深化译论与社会文化互动关系研究;三是推动传统译论的现代阐释,将“文质之争”“信达雅”等核心命题与当代翻译伦理、翻译技术结合,挖掘其现实价值。

张旭 广西民族大学

中国翻译理论史书写的几点问题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是一项重大课题,“重大”凸显的是该课题的价值和意义,也凸显出这一课题研究需要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可想而知,该研究会遇到不少挑战,既需要解决宏观层面的理论框架问题,也需要解决微观层面的文本阐释问题。书写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翻译理论史,是这一课题的目标之一。而书写中国翻译理论史也需要解决若干关键问题和难点问题,下面我拟就此谈一点看法。

1. 中国翻译理论史书写的起点问题

我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的起点在哪?这是关乎翻译理论发展历史有多长的问题。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合理有效的回答,实际上需要辨清中国“传统译论”是不是“翻译理论”的问题。如同“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中国古代是否有文学理论”一样,“中国古代是否有翻译理论”这一问题一直萦绕着我们的研究。从事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似乎可以避免陷入对此

问题的争论,但对于书写中国翻译理论史的学者来说,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理论”一词,是西方现代的学术概念,张佩瑶通过对“理论”的概念考察,认为可能的答案是“中国欠缺(甚至没有)现代意义的翻译理论”(2004:6)。一般认为,“中国传统译论”并不能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划上等号,学界更多地将“传统译论”理解为传统文献中关于翻译的论述、论说、讨论、评论、议论、散论。

如果以“体系性”为理论的必然要素来考察,那么传统译论将被排除在翻译理论史书写的范围之外,而如果这样的话,中国传统译论的价值将得不到理论史书写的认可,我们的翻译理论史将只有当代史,而无通史可言。鉴于这一矛盾,同时考虑到对事物发展历程的考察并不必然以其具备完整的形态为标准,不仅要考察事物出现之后的发展,还要考察事物是如何从无到有的,以及将来如何发展的,我认为以“关于翻译的理论性论说”来界定“翻译理论”可以解决这一矛盾。“理论”最重要的是其思想内容,而不是形态特质。罗宾逊(Robinson, 1997)的《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为这种界定提供了一定的范例依据。我们知道,西方译学史中,早期翻译家对翻译的讨论也是只字片语,散落在对其他事物的论述之中,被视为西方译论开源人物的西塞罗最重要的译学贡献就是区分了“演说家式的翻译”和“解说员式的翻译”,但他的言语并没有现代理论所要求的形态。

从广义而不是狭义的角度来看待“何为翻译理论”,这样既可以保留对传统译论的专项考察,彰显中国传统译论在中国翻译理论发展之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也能为将中国翻译理论史的起点定为古代最早的关于翻译的思想表达,提供有效而合理的辩护。而对中国传统译论的考察,宜采用“理论性”而非“体系性”来作为评判标准,主要通过论题、论域、话语和方法论的维度来评述中国传统译论对世界译学的贡献。

2. 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历史分期问题

历史分期是历史书写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西方通史类全球史学者如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 Stavrianos)、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等,在他们的历史编纂实践中以世界文明发展的总形势为依据来划分历史阶段。1955年,美国新世界文库推出一套《导师哲学家丛刊》,该文库按重要的哲学思想进行历史分期:信仰的时代、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思想体系的时代、分析的时代,而李思孝(2003)在其《简明西方文论史》中就借用了这一分期方法。在中国文论史书写中,王运熙、顾易生(2010)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7卷本)中采用的就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代”“清代”“近代”这样的朝代分期方法。上述这些学科历史书写中的历史分期标准各不相同,这些分期标准都无法直接借用到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中来。

其他学科学者对其考察对象历史分期的思考,可以为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提供诸多启示。在史的叙述和论断方面,需要体现翻译理论发展的特色和我们的识见。对于前人(古人)的翻译理论认识,我们需要客观地说明其观点以及其观点何以如此,既需要努力探求具体历史语境下某种代表性理论真实、完整的思想内容,还要探求其形成原因。在评述理论或理论观点时,需要在纵向上注意其与前后的继承发展关系,也需要在横向上注意其与同时代其他理论(翻译理论或非翻译理论)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在涉及背景时还要说明翻译理论与美学理论、文学理论、哲学思想、社会观念的关系,使读者获得鲜明的历史线索或完整的历史图景,而不仅仅是编写按朝代、年代先后排列的代表性理论作品的辑录。

我认为,对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的考察,不一定要按通行观念将翻译理论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时期,因为“传统译论”和“现代翻译理论”两者更多的是方法论的概念,是从理论的形态对翻译理论进行区分。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中依然有着传统的要素,传统译论是现代翻译理论发展的重要资源,同时传统译论也在进行现代转化和传播。即使是现代形态的中国翻译理论,也不是一下形成的,它从传统译论中生发而来,吸收了西方各种理论的成分,经过了一个较长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3. 对中国翻译理论未来发展的路径建议问题

进行历史性的研究并非只是为了回到历史中去,更是为了观照未来的发展。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的研究起点就是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学科的重要性,认识和书写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学科未来的理论建设“指路”。如果说,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翻译理论体系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标,那么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要从多方面为翻译学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有效的思想“支援”。

理论史不是编年史,而是问题史。翻译理论史书写必然需要批判性,它不仅是回顾和整理已有的理论成果,更是一种有方向感的重识与重构。这种重构并非客观中立的,而是带有价值立场、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的。我们重识过去的理论,往往是希望回答当下的问题。换句话说,翻译理论史书写不是讲述“我们过去有过什么翻译理论”,而是回答“我们为何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过去的翻译理论”,以便明确“我们该怎样打开新的思想空间,怎样构建未来的理论世界”。翻译理论史书写必然涉及选择哪些主体和文本,选择怎样的话语来阐释,这种选择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对当代困境的回应,对当下话语的征用。正是通过“重新提问”和“重新叙述”,理论史研究才把过去转化为解决当下问题的资源,从而为未来的理论探索设定议程,为新的理论生成创造空间。

对任何一项研究而言,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整体发展提出未来发展的建议和意见,这是极具价值而又极为困难的一项任务。要指示翻译理论的未来发展,翻译理论史研究必须要能揭示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其深层次问题的症结所在。当下翻译理论研究面临

着诸多需要解释的新现象,如翻译形态的变化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关系、AI 翻译伦理和可能导致的生态灾难等,我们无法直接看到未来,只能回到过去,用当下的问题意识去重构过去,从被忽略的或被遮蔽的“已知”出发,推导出未来发展的动向。

蓝红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唯物史观与中国译论史研究的范式革新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的研究,在新时代学术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推动下,正经历着深刻的范式转型。黄忠廉教授等在《硬核与疑难:中国译论发展探索之要》(2025)一文中准确地把握了当前研究的症结所在,指出中国译论史研究的关键在于系统梳理其发展全过程,聚焦“硬核”问题——即如何通过“三建”机制(基建、复建与创建)推动译论的系统性发展,同时直面阐释失真、史才史德等“疑难”障碍。这一洞见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译论史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中国译论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翻译实践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本质出发,构建具有主体性、系统性与时代性的译论史研究新范式。这一范式不仅要解决研究方法论的问题,更要回应新时代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提出的迫切要求。

回顾中国译论史的研究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史料整理到理论建构的演进轨迹。早期的研究多侧重于史料的挖掘与整理,这种基础性工作固然重要,但若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则难以揭示译论发展的内在规律。黄忠廉等(2025)提出的“三建”机制,正是对这一研究困境的深刻回应。“基建”阶段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的译论考古与范畴考释,这不仅是资料的收集,更是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以佛经译论为例,仅梳理“五失本、三不易”等命题远远不够,更需要探究这些理论表述与当时的社会物质条件、宗教传播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复建”阶段强调通过古今对话与中西互鉴,实现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这一过程需避免简单的概念移植或机械拼接,而应当是在深刻理解各自历史语境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创建”阶段则要求我们立足当代中国丰富的翻译实践——包括国家翻译实践、技术赋能下的语言服务创新等新形态——推动具有主体性的理论创新。这一机制体现了从“史料汇编”到“规律探索”的范式转换,其核心在于将译论史视为一个动态的、与社会实践紧密关联的知识生产过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这一范式转换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1859/2012)。将这一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翻译研究,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翻译活动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加以考察。从这种意义上说,翻译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或精神活动,而是一种物质性的跨文化观念再生产社会实践。它既受制于特定时代的经济基础、技

术条件与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社会文化的发展。王晓峰(2025)认为:“某个时代文化现象的产生与消亡都是由所处时代的社会生产条件决定的。”以佛经翻译的兴衰为例,其不仅与佛教东传的宗教需求相关,更与汉代以来丝绸之路开通带来的物质文化交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需求以及社会精神生活的普遍状况密切相连。同样,晚清时期对西方科技、政法著作的大规模译介,其根本驱动力可追溯至中国社会内部封建制度的危机与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要求。只有将译论史上的观念流变与这些宏观社会结构联系起来,才能揭示其内在的逻辑与动力,避免将理论史简化为纯粹观念的自律发展。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中国译论史研究需要构建一个更加立体、多维的分析框架。首先,必须深入考察翻译活动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关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翻译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翻译理论本身的内容演变,更要探究这些理论形态与特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技术中介的演进应当成为翻译史研究的关键维度。作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工具型中介的进步“使实践活动越来越便利,获取、存储和传播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实践能力和水平越来越高,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实践方式,提高了实践效率,同时也对主体的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朱健平等,2025)。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从机械印刷到数字网络技术,每一次重大的媒介革命都不仅改变了翻译文本生产、复制与传播的速度与规模,更深刻地重塑了翻译的社会功能、译者的工作方式乃至翻译本身的定义。这种技术维度的考察,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将翻译理论抽象化为纯粹的精神产物。此外,权力话语的博弈是唯物史观分析翻译史不可或缺的视角。翻译从来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纯思想交流,它总是与特定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和殖民或后殖民语境紧密交织。唯物史观要求我们进一步揭示这些权力话语背后的经济根源与阶级利益,从而对翻译史上的操控、改写、禁译等现象做出更具历史深度的解释。这种多维分析框架,有助我们突破传统译论史书写中常见的编年史罗列与观念史叙事局限,真正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当前中国译论史研究面临的核心“疑难”,在于如何平衡主体性与普遍性、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的张力。一方面,过度依赖西方理论范式可能导致本土话语的失语,使得中国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无法得到有效的理论提升;另一方面,对传统的简单回归又可能陷入学术孤立,使中国译论难以与世界学术共同体展开实质性对话。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科学的路径。毛泽东(1937:319-320)在《矛盾论》中精辟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无个性即无共性。”这一哲学原理为我们理解知识体系建设中主体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提供了深刻启示。中国译论的普遍性价值,恰恰蕴藏于其对自身特殊性问题——如“神似”“化境”等审美范畴、“政治等效”(杨明星等,2020)等实践原则——的深

刻洞察与系统阐释之中。通过“中·西·马”融通的创新机制,以马克思主义为“化合剂”,推动西方理论的本土化重构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才能形成具有内生创造力的知识生产体系(孙利天等,2021)。这种融通不是简单的理论拼贴,而是要经历一个深刻的“批判—吸收—超越”的辩证过程,最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译论史书写的过程中,史家的“才”与“德”构成了不可回避的伦理维度。“才”体现在研究者跨越古今中西鸿沟的阐释能力,即如何在尊重历史本真的前提下,使传统译论智慧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德”则关乎其书写历史的公心与勇气,即在面对复杂的学术生态和人事关系时,能否保持客观公正的学术判断。黄忠廉等(2025)敏锐地指出,史家既要防止“过度阐释”导致的历史失真,又要克服“人情褒贬”与“门户之见”对学术判断的干扰。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这要求史家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对前人思想进行任意解读,而应通过语境还原与视域融合实现“传真”式诠释。具体而言,在处理中国传统译论时,需要回到理论产生的原初语境,厘清诸如“善译”“信达雅”“神似”“化境”等核心范畴的本真含义及其哲学根基;在评价现当代译论成就时,则应当立足理论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避免用今天的标准苛求前人,也不应因个人好恶而偏离客观评价的准则。这种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是确保译论史科学性与权威性的前提。

展望未来,中国译论史研究应当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实现从“区域史”到“作为方法的中国译论”的升华。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将中国译论仅仅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而应将其置于全球翻译研究的宏大视野中,通过系统提炼其核心范畴与理论模型,为理解人类翻译现象提供独特的东方视角。例如,对中国传统译论中“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一思想脉络的现代梳理与理论升华,其意义绝不仅限于厘清中国自身的翻译思想史,它更可能为世界翻译学界理解翻译标准的层级性、审美再现的复杂性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动态发展,提供一个迥异于西方“对等”范式的新视角。在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和人工智能技术颠覆性变革的双重背景下,翻译活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文化冲突与技术规约等共同课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中庸”思维、整体观念与伦理优先的传统,或许能为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独特的东方智慧。这种从“理论的消费者”到“理论的生产者与贡献者”的角色转变,正是中国译论史研究的根本宗旨和时代使命。

总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译论史研究,旨在通过“三建”机制破解“疑难”,在深度回归自身文化传统与实践现场的同时,始终保持开放的视野与对话的自觉。它不仅是对翻译思想的历史梳理,更是对中国翻译实践内在规律的探索,是对外回应文化自信的时代诉求、对内强化学科根基的战略举措。这种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独特的翻译实践,包括佛

经翻译的“案本”传统、近代西学译介的“求信”探索、当代政治话语外译的“再语境化”挑战等,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畴和方法论体系。同时,这种研究还需要具备全球视野,将中国译论置于世界翻译知识共同体中加以考量和定位,通过与国际学界的平等对话,彰显中国译论的独特价值。唯有如此,中国译论史才能实现从地方性知识到普遍性贡献的创造性转化,为构建人类翻译知识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最终实现从文化自觉到理论自信的学术跃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将翻译理论的演进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脉络中考察,避免陷入唯心主义的理论窠臼,从而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理论体系。

朱健平 湖南大学

参考文献:

- Robinson, D. 1997.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C].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陈福康. 2010. 中国译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邓金. 2009. 解释互动论[M]. 周勇,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黄忠廉, 濮阳荣. 2025. 硬核与疑难:中国译论发展探索之要[J]. 外国语文(3): 1-8.
- 李剑鸣. 2017. 学术的重和轻[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思孝. 2003. 简明西方文论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罗新璋. 1984. 翻译论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克思. 1859/2012.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5.
- 马祖毅. 2006. 中国翻译通史(共5册)[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毛泽东. 1937/1991. 矛盾论[M]//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299-340.
- 孙利天, 常羽菲. 2021. 实践:中西马哲学会通的理论结点[J]. 社会科学战线(5): 37-42.
- 王尔敏. 2005. 方法史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海光. 2014. 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王晓峰. 2025. 文化形态与时代发展复杂关联的唯物史观阐释及其当代启示——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分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4): 68-79.
- 王运熙, 顾易生. 2010.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7卷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杨明星, 赵玉倩. 2020. “政治等效+”框架下中国特色外交隐喻翻译策略研究[J]. 中国翻译(1): 151-159, 190.
- 喻仲文. 2013. 造物艺术与意识形态[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张佩瑶. 2004. 对中国译学理论建设的几点建议[J]. 中国翻译(5): 3-9.
- 朱健平, 龚骞. 2025.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翻译实践中介系统研究[J]. 外语导刊(3): 106-114.
- 朱志瑜, 张旭, 黄立波. 2019. 中国传统译论文献:主题与分类考察[J]. 外国语(2): 62-74.
- 朱志瑜, 张旭, 黄立波. 2020. 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六卷本)[G]. 北京:商务印书馆.

朱志瑜,张旭. 2009.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主题与分类考察 [J]. 东方翻译(2): 9-18.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Exploring Critical Issues and Paradigm Innovation

HUANG Zhonglian ZHANG Xu LAN Hongjun ZHU Jianping

Abstract: In the March 2025 issu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he article “Key Issues and Difficulties in Exploring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Translation Theory” was published. This paper furthers the discussion and explores new paradigms for writing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Huang Zhonglian argues that the focus of such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lies in establishing a “three-construction mechanism” and integra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le the challenges involve balancing historical accounts wit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onducting in-depth descriptions. He emphasizes guiding efforts with key priorities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through “analytical narrativ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ntributing to discourse development. Zhang Xu identifies key areas including the coll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literature, the evolution of them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social culture, and the extraction of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value. The challenges involve the identification of scattered and lost documents, the definition of periodiz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systems and academic positioning,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He also proposes solutions and prospects such as digital construction. Lan Hongjun highlights that clarifying the starting point and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is a key issue. Historical research, he argues, should serve to inform future development, aiming to establish a translation theory system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writing of translation theory history is not merely about recounting past theories but about explaining why we need to understand historical theories in specific ways, thereby clarifying how to open new intellectual spaces and construct future theoretical worlds. Zhu Jianping advocates for guiding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promote paradigm innovation. Research should go beyond the mere organiz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rough mechanisms of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restoration, and cre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should be examined within it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highlighting translation’s essence as “materialistic cross-cultural reproduction of ideas.” The goal is to construct a narrative of translation theory history that is subjective, systematic, and contemporary, elevating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local knowledge to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thereby achieving academic self-awarenes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textual criticism; modern-orientedness;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future developme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aradigm innovation

责任编辑:龙丹